

樓嘉軍，《上海城市娛樂研究(1930-1939)》

上海：文匯出版社，2008。319頁。

張 寧*

本書專論老上海的娛樂業，特別是鼎盛的1930年代。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，上海興起一股懷舊熱潮，各式回憶作品紛紛出版，圖片、畫報翻印成風，夜上海的輝煌一再被渲染、擴大，但事實上真面貌究竟為何，反而隱而不彰。大陸歷史學界（特別是上海的學術單位）深感責任重大，在過去二十多年中，一方面投入人力，利用報刊、檔案，從事實證研究，試圖還原歷史真相；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譯外國學者的相關著作，以資借鑒。時至今日，已累積了相當成果，可以從微觀的個案研究，進一步從事宏觀的論述，本書即為此一脈絡下的產品。本書雖將研究時段定於1930年代，但其涵蓋範圍從上海開埠直至1950年代，彷彿是一本近代上海娛樂業史。作者樓嘉軍教授蒐集史料不遺餘力，研究紮實，有青出於藍，更勝前輩之勢。除此之外，作者雖為歷史學者，但因長期任教於旅遊系（華東師範大學），在分析上海娛樂業時，廣泛借用社會學、地理學、經濟學等學科理論，觀點新穎，讀之令人驚喜。

最令人驚喜的是，作者從空間角度檢視上海娛樂業的分布。本書第四章借用人文地理學的概念，將整個上海用一個中央娛樂區和五個娛樂次中心區的五角形模型（即所謂的 $K=6$ ），予以分析，頗具新意。歷史學者向來倚靠時間概念，習於將各式資訊依時間順序排列，觀察其間變化，進而解釋歷史進程；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至於空間的概念則非所長，地圖在歷史學著作中，通常僅是附件，不是主體。但近年來，歷史學界已逐漸體會空間的重要性，特別是在城市史的研究當中，常從空間的角度思考，可以看出前所未見的原因與問題。若要有效地在時間思維中加入空間概念，必須利用歷史地圖；過去這類地圖多深藏圖書館，取用不易，現在拜網路之賜，唾手可得，同時處理的技術與工具也日益便捷。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借用其他學科已廣泛使用的 GIS 地理資訊系統，利用此一系統，可將過去不同年代的地圖加以校正、定位，從而相互套疊。目前世界上幾個從事中國研究的中心，包括上海復旦大學、台北中央研究院、日本大阪大學、美國哈佛大學、法國里昂第二大學等，均已開始進行這方面的計畫，成果可期。本書作者雖已成功引入空間概念，為城市史研究拓展出新的視野，但美中不足的是，作者所使用的仍是當代電子地圖，而非歷史地圖；當代的電子地圖固已足以顯示上海的全貌，但亦容易使人忽略歷史上的人為界限，如租界、華界的三界分治，從而忽視不同管理機構可能對其轄下區域的不同布局。例如，法租界應以霞飛路、亞爾培路一帶，公共租界以南京路、西藏路一帶，華界以城隍廟一帶為其中心娛樂區，各個地區所提供的娛樂類型迥異，消費客源亦不相同，用這個角度看來，上海整體娛樂業的分布就可能是三角形，而非 $K=6$ 的形狀。此外，電子地圖顯示的是靜態的時間，不似 GIS 校正後的歷史地圖容許不同年份的套圖，可以看出 $K=6$ 在長時段形成的過程，並進一步檢驗是否有其他小型娛樂場所聚集區，因不符合 $K=6$ 的模式，而出現遭研究者忽視的情況，例如江灣跑馬場與引翔跑馬場，就似乎不在作者分析的範圍。

本書涵蓋的時間範圍既廣，所述之娛樂業又種類繁多，吃、喝、玩、樂，均在其中，要如何才能面面俱到？除上述空間概念外，作者基本上掌握五個方向，即娛樂業興起的背景、鼎盛時期、輝煌下的危機、經營者、消費者。在第一章，作者詳細陳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城市電力、交通等基礎設施的設立，以及洋娛樂的引進，以為背景；第二章討論鼎盛的 1930 年代，特別分析娛樂體系的成熟度與娛樂品牌的出現；第三章則利用天蟾舞台、金城電影院、百樂

門舞廳的內部檔案，說明其實輝煌之下，暗藏危機；第四章從空間角度檢視上海娛樂業的分布；第五章分析娛樂業的經營者，包括外商、華商，華商之下，又繼續細分粵商與幫會；第六章分析上海的人口、工資、年齡、性別，以此解釋娛樂業以男性消費為主體的原因。

這樣的章節分配，頗為合理，既討論經營者，又討論消費者，既關照人口結構，又留心性別問題，應能提供讀者全面且深刻的分析，但作者受限於兩項客觀因素，最終不免仍有遺珠之憾。第一項客觀因素在於史料在年代、產業、社會階層各方面分布不均，作者被迫在敘述過程中，不斷視資料豐富與否，調整重心。例如，本書前半部因討論城市電力、交通等基礎設施，偏重「城市中上等收入群體的市民」，後半部討論移民、嫖賭、情色業，重心又移至中下階層；前一節在分析所得分配時，還仔細計算工人、職員、中小學老師的微薄薪資，下一節分析消費行為時，又全力描述富裕階層的炫耀性消費。尤有甚者，第二章為烘托 1930 年代上海娛樂業之輝煌，作者詳述娛樂體系如何成熟、娛樂品牌如何相繼出現等等；當讀者還沉醉在不夜城的迷夢之中，作者忽然筆鋒一轉，在第三章裡開始憂心忡忡告訴讀者，其實娛樂業在整個 1930 年代，沒有一年不處於內憂外患之中，先有 1932 年的「一二八」事變、後有 1937 年的「八一三」事變，中間還有 1934 年的經濟危機與新生活運動等衝擊，甚至孤島時期的繁榮也只是曇花一現，不值一哂。由於全書的重心移轉太快，有時予人無所適從之感。本書在第六章之後，便嘎然而止，因而僅有前言，沒有結論，使人無從得知作者對整體上海娛樂業的真正看法：到底 1930 年代上海娛樂業的輝煌是虛幻的假象，還是確實的存在？上海娛樂業的主要消費者到底是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，還是大量湧入城市的中下階層移民？

第二項限制在於定義不夠細緻。作者用鐵板一塊的方式處理太多的事物，阻礙了深入分析的可能性。首先，作者對上海開埠之前的傳統娛樂活動，一律歸於「農耕時代傳統娛樂生活方式」；開埠以後的新式娛樂則悉數冠以「現代城市娛樂活動樣式」，這樣截然的二分，導致作者忽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延續，

例如近代從私園到公園的轉變、現代遊樂場中明顯具有傳統成分（如戲園、茶館、書場、地方戲），以及洋賭博與傳統賭博間的競合關係等等。

作者對在滬外僑的描述，整齊劃一，彷彿所有外僑國籍相同、文化類似。事實上，從目前的研究已可看出，外人社群極為分歧，不同國籍在文化與利益上的歧異性，應不小於從四鄉湧入上海的華人移民。公共租界與法租界間，步調鮮有一致，小至賭博應禁或應弛，大到娛樂場所該何時打烊，均各持己見，爭執不下。即便在公共租界內，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國社群，也為了爭取更多利益，不時角力；一年一度的工部局董事選舉，便是攻防的重要場景。在此情形下，對於外僑宜做區分，否則難以理解為何跑馬廳的董事多為英商？而早期投資電影院者則多為西班牙商人？公共租界跑狗場為何建立不久，旋即被禁？而在同樣的輿論壓力下，法租界的跑狗場卻安然無事？

筆者認為，作者所謂的「洋娛樂」很多並不屬於「大眾娛樂」(entertainment)的範疇，例如西人最感興味的「野外打獵」，係傳統英國鄉紳休閒時的一種「運動」(sport)，有強烈的階級性；在西人眼中，絕非大眾化的娛樂，類似的活動還包括「跑馬」、「紙獵」、「總會」等。英人之所以熱中這些活動，正因他們在本國多屬中產階級下層，甚至工人階級，罕有從事打獵或跑馬的機會，才渴望在海外借殖民身分一逞雄風。正是因這類運動有強烈的排他性，華人不易欣賞，西人也無意傳播，才造成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所謂的「洋娛樂，洋人樂」現象。所以筆者不認為，這些具有明顯排他性、階級性的娛樂活動，可與魔術、馬戲、電影等大眾娛樂混為一談。

就是「西方」一詞，定義也有欠清晰。所指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」究竟是英國、法國，還是日漸興起的美國？所謂「西方工業娛樂文明」的實質內容又是什麼？筆者以為，不宜假定歐美各國擁有普遍性的娛樂概念與內容，在作者研究的這一段時期，這些國家在休閒娛樂方面正經歷劇烈轉變，各式活動由小眾轉向大眾，各國歷程均不相同。目前看來，英國雖是大部份球類運動的起源地（如足球、網球、高爾夫球、羽毛球等），但美國才是大眾娛樂的創造

者與輸出國。如欲深入分析大眾娛樂在上海興起的過程，或許有必要進一步區分不同娛樂在不同國家的源流，尤應留心它與美國商業文化與消費文化間的關係，才能看出確實的傳播路徑。

總之，檔案資料的分布不均與定義的不夠細緻，阻礙了作者對近代上海華洋雜處的娛樂業作出更深刻的剖析，頗令人可惜。不過，此書雖有遺珠之憾，但已將過去大陸學界有關上海史的微觀研究成功地整合，並引入城市史研究迫切需要的空間概念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上海由於華洋長期共治的殖民特性，很早便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，大量的新式休閒活動在此登陸，再逐步進入整個中國。不過，中國對外來事物並非無條件擁抱，它藉著自身在休閒娛樂方面的深厚傳統，對這些娛樂活動進行了文化上的篩選，有些娛樂留存下來，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份；有些則逐漸被時間淘汰，終究無法生根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上海的娛樂業不僅是一個城市的故事，也是整個近代中國休閒內容轉變的縮影，值得學者投入更多的心力，從更寬廣的角度，更為細緻的分析，繼續做深入的研究。